



閱讀書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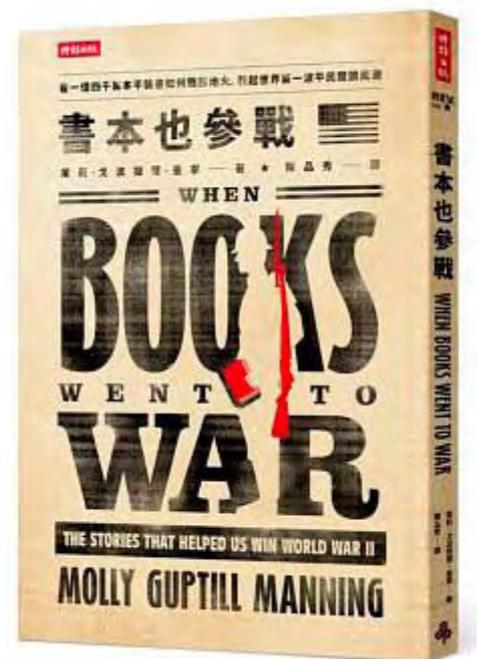
## 筆誅勝於劍伐：讀《書本也參戰》

● 楊子震\*

HBO 迷你電視影集《諾曼第大空降 (Band of Brothers)》(2001 年) 內容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第 101 空降師的作戰經歷，其製作係由著名導演史蒂芬·史匹柏 (Steven A. Spielberg) 和著名演員湯姆·漢克 (Thomas J. Hanks) 攜手規劃及執行，原著為史蒂芬·安布羅斯 (Stephen E. Ambrose) 的同名書籍。在該影集的第 9 集〈為何而戰 (Why We Fight)〉中，有一幕是機槍陣地的雙哨換班。下哨的士兵遞了本小型書冊給接哨的同袍，當老兵正好整以暇地坐下準備閱讀時，同組的新兵卻興沖沖地忙著試拉槍機、調整覘孔及確認射界，引起老兵的不快而出聲斥責。

劇中老兵掏出的小型書冊即為所謂的戰士版書籍 (Armed Services Editions)，是一種便於攜帶且隨處可見，適用於前線消遣的平裝書。而該幕出現的書籍即為初版發行於 1943 年的《布魯克林有棵樹 (A Tree Grows in Brooklyn)》，作者為貝蒂·史密斯 (Betty Smith)。該書以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為背景，用一小女孩的眼光，描述移民家庭的都市生活與對抗貧窮困苦的掙扎。

由茉莉·戈波提爾·曼寧 (Molly Guptill Manning) 寫作，陳品秀翻譯的《書本也參戰 (When Books Went to War: The Stories that Helped Us Win World War II)》(臺北：



\* 楊子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

時報出版，2015年）一書中，便屢次提及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頗受歡迎。例如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因瘧疾纏身而臥病於病院時，寫信給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作者，告知其原來因為曾經參與的戰鬥過於殘忍血腥，以致開始懷疑世界以及其自身是否尚有愛戀任何人事物的可能，但因閱讀該書，方重新尋得生機與自信。又如一名西點軍校出身的軍官曾向人表示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的閱讀協助其與麾下的部隊在敵火下保持鎮定。儘管該名軍官在戰前並不愛看書，軍校就讀期間亦甚少踏入圖書館，但他真心喜歡該書，即使戰鬥最激烈時仍就惦記著故事的內容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戰部隊主要是由原為平民的軍人所組成。無論志願入伍者，抑或接受徵召者，多半對軍事毫無準備且無所知。儘管接受了一定的人伍或專長訓練，但是前往前線途中的無聊、憂懼，實際戰場上的暴力、驚恐，皆對平民出身參戰者帶來身體上、心靈上的莫大傷害。為保持士氣的高昂，郵件服務、益智遊戲、

音樂歌唱、運動活動等適度娛樂的提供被軍方認為確實有其必要。HBO 影集的那一幕應該就是當時前線極為常見的光景。而書本不僅可用於娛樂消遣，亦是思想、心理層面的戰爭利器。

根據東大教授加藤陽子於其《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》（臺北：廣場，2016年）一書中的整理，對於何謂「戰爭」，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戰爭為國與國之間對於主權或社會契約的攻擊，其目的在於強迫對手國改變其最重要的社會基本秩序。另一較早期的定義有 19 世紀前半由克勞塞維茲於《戰爭論》中曾提出的「戰爭僅是政治延伸」。該著作的視角是由持續戰敗於拿破崙軍勢的普魯士出發，指出政治領域的交涉以及

以武力進行的軍事行為間具有延續性。

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，戰爭型態轉變，「總體戰（total war）」出現，前線或後方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。國家的青年男子人口數往往被視同為可動員士兵員額數。即使未直接參與戰鬥行為，平民亦直接或間接參與戰爭的準備、進行或受到影響。為了避免國民質疑國家從事戰爭的正當性，如何明確戰爭目的成為國家治理上的至高要務



。國家需對國民宣揚戰爭結束後的願景及補償，必要時需重新設定國家目標，方得以持續動員國民，並維繫國家與國民的關係。盧梭和克勞塞維茲對何謂戰爭的見解至今依然有其價值。

戰爭既然不分前線後方，意味著直接戰鬥發生的同時，參戰國間彼此透過宣傳（Propaganda）亦就政治、經濟、社會上的意識形態加以競爭。在該競爭過程中，戰爭目的及國家目標的周知滲透極為重要。宣傳的渠道即為廣播、電影、雜誌、報紙以及書籍。而在郵件未能及時送達，又缺乏電影、運動等文康設施來振奮軍心時，書籍便往往成為參戰部隊的唯一消遣。

美國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前，「國防募書運動」已經展開。正式參戰後則更名為「勝利募書運動」，並於 1942 年達成累計募集書籍 1 千萬冊的目標。此階段為民間募集書本提供予美國軍方利用。而同一年，由出版業界代表所組成的「戰時書籍委員會」成立，負責印製美國陸海軍訂購的書籍。書籍的內容經過選擇檢視，形式亦另有設計。此時，獲得青睞的是尺寸較小、重量較輕的平裝書形式。

平裝書在過往並非美國出版界的主流，因為精裝書利潤較高，而平裝書被視為廉價商店的品項。然而，受限於戰時的配給制度，傳統製作書籍所需的紙張和用於封面的棉布短缺，故出版商不得不另闢蹊徑，以追求利潤。戰爭除了造就美國電影業外，亦刺激了圖書出版業界。美國人的購書量於 1943 年較前一年多出了 25%，此即被認為應歸功於平裝書的普及化。戰士版書籍的出現即為此書籍普及化潮流的一環。

為了確保最大的印刷冊數，並貼近軍人的生活形態，戰士版書籍採用了新的版式設計及印製技術，並採用較為輕薄的印刷用紙。除具有柔韌特性可承受擠壓外，書籍尺寸亦配合制式軍服口袋調整大小。戰士版書籍中較受歡迎的類型首推當代小說，其下依序為歷史、推理、西部小說等。儘管設定的選書衡量標準極為寬廣，對於是否資助敵國或攻擊盟國等面向上仍有審慎的查核，亦對是否涉及宗教、種族、職業的歧視或不敬等更是小心翼翼。

對於書籍的作者而言，一旦著作被選入戰士版書籍，即意味著擁有眾多的讀者。若成為話題迅速傳開，甚至會在美國本土引起迴響。《大亨小傳（The Great Gatsby）》（1925 年）在作者史考特·費茲傑羅（F. Scott Fitzgerald）生前並未被視為成功的作品，



然而當該書印製成戰士版後，在軍中供不應求，由幾乎為人所遺忘的窘境走出，一躍成為美國的經典文學作品。

戰士版書籍中，貝蒂·史密斯的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被認為是最受歡迎的著作。原因或許在於其描述的故事情節引起士兵們對其童年記憶的共鳴，使彼等暫時忘卻令人精神緊張的煩心瑣事。書本在戰爭中確實扮演了療癒的角色，撫慰前線軍人的心靈，並發揮了休閒娛樂的功能。

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美國政府開始著手軍隊的縮編、裁撤以及兵士的復員。復員問題的重點主要在於退伍軍人的就業問題，而在心理層面上如何輔導他們早日重返平民社會亦為一大隱憂。1945年修正過後的「美國軍人權利法案（Servicemen'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，簡稱 G.I. Bill of Rights）」允諾士兵可獲得諮詢、殘障、失業補助，住宅和創業的低利貸款，以及為期4年的大學或職業訓練。日後，在此為期9年的計畫中，約有780萬退伍軍人參加了教育或訓練課程，其中有220萬軍人註冊於大專以上的學校。

儘管非裔及女性族群因為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壁壘障礙影響，難言充分受惠於此項措施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該計畫確實創造了美國社會階層的流動，並打破教育資源的藩籬。該計畫的成果應該可以歸功於由募書活動開始的知識傳播發展。戰士版書籍的貼心設計、內容篩選使得書籍閱讀得以普及深化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促使戰前對書本避之唯恐不及的兵士開始對閱讀、研究和重返校園產生興趣、渴望及憧憬。

戰士版書籍的大量發行使閱讀習慣得以散播於美國的普羅大眾，亦使得《大亨小傳》的地位提昇至經典文學。而戰後實施的「美國軍人權利法案」則創造出一新的文化中產階級。《書本也參戰》便是敘述這一段筆桿威力不輸刀劍的故事，由戰前經戰時，乃至戰後。

